抗战与政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國父遺像



總理遺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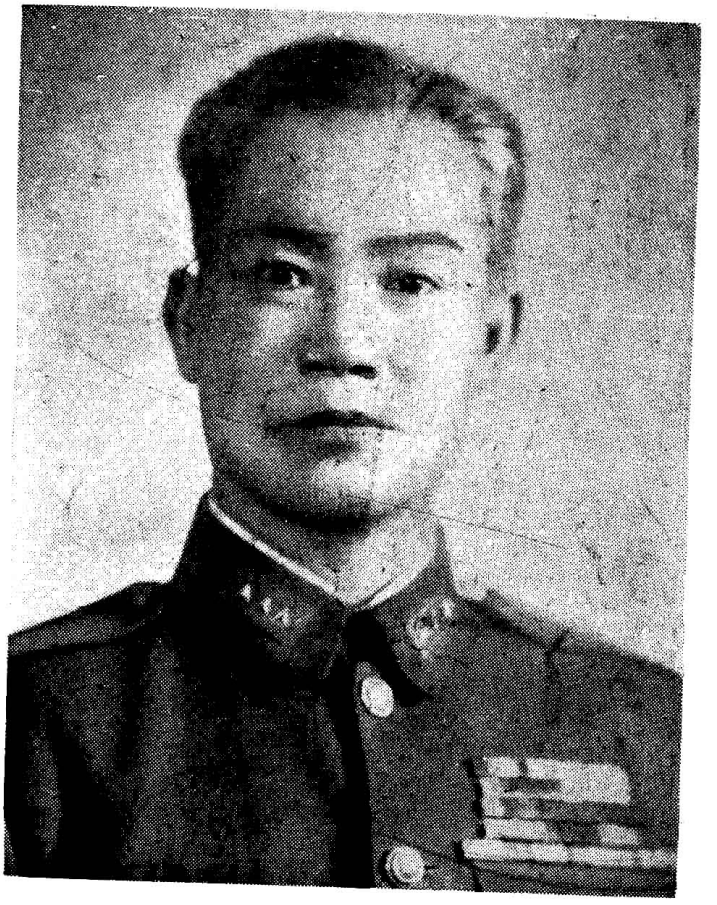
余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積四十年之經驗，深知欲達到此目的，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奮鬥。

現在革命尚未成功，凡我同志，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，建國大綱，三民主義，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繼續努力，以求貫澈，最近主張，開國民會議，及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尤須於最短期間，促其實現，是所至囑。

蔣委員長玉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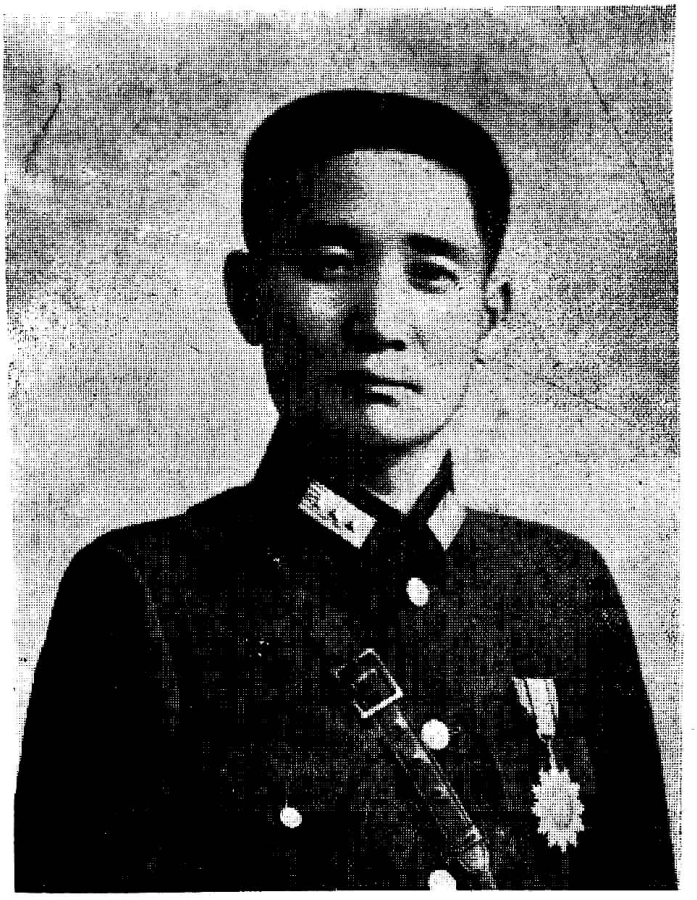


陳前部長誠玉照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張部長治中玉照


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本部結束時官佐合影



抗戰與政工

緒論——抗戰以前的回顧

一　革命的產物

在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長期抗敵戰爭，已獲得最後勝利而結束了。在八年的抗戰當中，我全國軍民，歷盡了辛苦，犧牲了一切，終於克服了頑強而優勢的敵人，這便充分證明了三民主義的勝利和革命軍人愛國的精神。

我國的革命軍隊，孕育於　總理手創的黃埔軍校。　總理在民國十三年六月黃埔軍校開學的那一天，剴切向員生們訓示：深致慨於辛亥以來，革命事業的失敗，並且把中山兩國革命的難易，和所得結果的大小，詳細比較，而申引出一個結論，就是我們只有革命黨的奮鬥，而沒有革命軍的奮鬥；於是　總理決心以黃埔軍校爲骨幹，創立革命軍隊。

革命軍隊是怎樣訓練成功的呢？　總理曾明白告訴大家：「軍隊的奮鬥精神是從主義而生。士兵要發生奮鬥精神，便先要有主義。先有了革命主義，才有革命目標，有了革命目標，才發生革命精神。」這一番大道理，是革命軍隊訓練的原則，也是革命軍隊中政治工作的綱領。黃埔軍校遵從着　總理的訓示，便樹立起具有歷史意義的政工制度——黨代表制，及至是年的冬天，黃埔軍校教導兩團先後成立黨代表制度，便由黃埔軍校擴展到「校軍」。十四年七月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後，國民革命軍也具有了它的雛形，在軍事委員會之下，設立政治訓練部，黨代表制度，進一步擴充到全體國民革命軍了。到十五年本黨誓師北伐，革命軍事進展的迅速，爲歷史上所罕見，軍隊政治工作，也怒放了一枝鮮豔的花，發揮了最偉大的效力，而形成了至今猶爲人們所追憶的黃金時代。

從上面的史實看起來，便可知道：革命事業的成功，必賴武力，革命武力的發展，則有賴於軍隊政治工作；所以，軍隊政治工作，爲革命的產物。有的人看見蘇聯軍隊政工成立在我國之先，便推論到中國的政工導源於蘇聯。這種見解固係根據事實，然而却只看見事實的一面。須知：革命運動怒潮澎湃的今日，軍隊政工，已具備必然產生的因子，就是沒有蘇聯的影響，我國的革命隊伍，也必然會產生某種形式的政工。時代到了，需要迫切了，這革命產物的軍隊政工，也就應運而生了。

二　精神勝過物質

革命的事業是非常的事業，革命的學問是非常的學問，不能拿尋常的道理來解說，也不能拿普通的尺度來衡量。這完全出於

衷心信仰，應乎時代潮流，發爲偉大力量，其所獲結果，也非常人所能預測。這種精神力量是如何宏大呢？翻開我們的革命歷史便到處可以找到證例。「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在廣州城裏的，便有李準所帶的水師，張鳴岐所帶的陸師，和燕塘的許多新兵及滿洲的駐防軍，總計不下五六萬人，當時革命黨的人數，不過是幾百人……衝鋒隊的人，才有武器，有武器的，不過三百人，所打的敵人，不只三萬人。革命黨祇用三百人，便敢打三萬人。」其實，何嘗只黃花崗一役是如此，其他革命諸役也莫不如此，本黨先烈的起義，「大多數是赤手空拳，有了手槍炸彈，便以爲是很好的武器，每次起義，總是很少的這種武器，去和清兵奮鬥。當時的清兵有多少呢？從前有旗下綠營，水師和巡防營，後來又有新兵，總共不下一百萬。」本黨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不斷鬥爭，終于推翻了幾千年的專制，建樹了巍然屹立東亞的中華民國。

民國成立而後，經過十三年的長期混亂與軍閥割據，黃埔建軍方纔開始，設立政工組織，實施政治訓練，革命精神的發揚，千百倍於往昔，革命形勢，也入於新的階段。黃埔軍校在　校長蔣先生領導之下，加强政治教育，堅定革命人生觀，發展革命組織，認清革命對象，剷除革命障礙，在短短三四年間，竟統一了全國，重奠了黨國的基礎。在此時期，精神力量的表現，眞足夠光明燦爛了。

在十四年一年之內，黨軍兩次東征，回師廣州，所向披靡，竟本黨歷年未竟之功。戰鬥的慘烈，像棉湖、惠州諸役，都爲前所未覩。棉湖的戰鬥，校軍（後改稱黨軍）不過一團（教導團）的兵力，擊潰敵軍二萬餘衆。今天來讀當日的記載，猶令人振奮不已。其中有一段說：「三月十三日，自晨進擊，教導第一團，以疲戰千餘之衆，獨當新銳二萬餘之敵，何（應欽）團長，竭盡智勇，將士用命，前仆後繼，犧牲慘烈。至此已苦戰半日，仰視天容日僅當午，右翼許旅，已否到達，尙無消息，鯉湖方面之敎導第二團，亦失聯絡，總預備隊，已使用無餘，而敵人兵力雄厚，有增無已，下半日之戰況，正不知如何結果。團長祇抱決死之心，盡戰鬥之能事與敵週旋耳。」又一段說：「午後零時二十分，團長命新回之學兵連與敵開始戰鬥，衝鋒陷陣，白刃相接，屢摧强敵，能達到戰鬥之使命。無奈該連人數僅六七十名，雖能在上北湖東北岸與敵耐戰，而上北湖東南，仍有敵人密集部隊，向該連左翼包圍。此時總預備隊四已無餘，所餘者特務連二十餘人，及機關槍一架。團長乃命機關槍連迅速增援。」我們只要讀這短短的兩段紀載，就可知當日情勢如何危急，而革命軍終能歷盡艱險，將强敵完全擊潰，正可想見精神力量，是如何偉大。

至於說到惠州之役，更是動人。大家知道，惠州是天險；但這天險的惠州，形勢是怎樣呢？記載告訴我們：「惠州後枕東江，前臨西湖，三面環水，城高而堅，自唐代迄今，千餘年來，歷經攻戰，從未失守。該縣縣誌，稱其形勢，謂諺有之曰：『鐵練鎖孤舟，飛鵝水上浮，任憑天下亂，此地永無憂』，眞可說是歷歷如繪了。這時敵軍在城內的固然不少，各方面援軍，也源源而來，革命軍竟以六七百名的先鋒隊，用竹梯爬城，這不能不說是極艱難的任務。因爲在這種地形之下，以這樣薄的兵力，接近城根，已屬不易，還能說到爬城！當爬城的時候，「雙方步槍聲，機關槍聲，野砲聲，山砲聲四面雜作，如波濤之怒吼，如風雨之

暴至。我飛機則在城之上空飛翔，散發宣傳品，我砲兵則向城內猛烈射擊。我第四團先鋒隊將次逼近城脚，惟敵方火力甚猛，我扛竹梯之勇士雖達城脚，死傷過半，無法登城。」這也就困難極了。然而革命軍終於次日達到爬城任務，寫下革命戰史中異常光榮的一頁。

這種革命精神的傳統，隨着革命武力的發展而發展，尤其在北伐時期，最爲顯著。北伐軍總共不過十萬人，裝備也是劣勢，而出師以後，不至十個月的光景，打倒了孫吳兩大軍閥，擊潰了他們幾倍的兵力，克復了十幾行省，奠都南京，這樣發展的速度，絕不是通常的道理可以說明的。又如最近的抗日戰爭，以倭寇數十年的準備，優勢的裝備和兵力，用鷹隼搏擊的姿勢，來向我進攻，而國軍始終保持着一往無前的勇氣，予敵人以無情的打擊，担負了反侵略急先鋒的任務，揭開侵略者毫不足畏的面目，給予東西各個反侵略國家以「堅決奮鬥，必獲勝利」的戰果，也就是「精神勝物質」的鐵證。

三 「嚴父」與「慈母」

革命思想的灌輸，革命精神的培養，以及軍隊戰鬥力的提高，自然是政治工作的神聖使命。這個使命之完成，却非一件易事，其間實在有一番精深的道理。自然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一個政工人員，要想自己的工作成就，首先就得同士兵們同生死，共榮辱，冒險犯難爲他們的表率。然而最要緊的，還是要有一種親愛精誠的精神，在彼此心靈之間交流，使士兵們發生深切愛戴的情感，自己的一言一動，都能發生極大的力量。做到了這一點，才可說是達到政治工作高深的境界。

關於這個道理，我們不能不談到政工發源地的黃埔軍校。黃埔在創辦的時候「四面都受了反革命軍隊包圍，經濟的困難，眞是莫過於此。公家的錢一個也收不到；無論鐵道的收入，以及其他各種稅收都被滇桂軍及陳炯明等，一概收去。」學校的情形，更是困難不堪。「有些日子，明天的伙食，今天晚上還沒有籌到。」在這種極端艱困之中，學校是怎樣維持它的存在呢？這就是完全靠了校中的廖黨代表仲愷先生。仲愷先生爲了這，費盡苦心，到處張羅，甚至還要到軍閥那裏去商量。商量後回家的時候，每到夜靜更深。他說：「我非常苦痛，非常受氣，天天晚上，都要去會楊希閔，劉震寰，等他們把煙燒完，然後才向他們說借款來辦黃埔學校。」廖黨代表對於黃埔的革命青年，完全抱着「如保赤子」的心情，爲了他們的養育，不惜本身歷盡千辛萬苦。

我們知道，黃埔是一所革命軍事學校。爲着培養革命青年將校，需要嚴格的訓練，更需要鐵的紀律。校長蔣先生執行嚴格的教育，要把每一個分子訓練得像鋼一般堅強，把這個團體鍛冶成鐵一般牢固。而廖黨代表呢？他却是循循善誘，教誨不倦，使得青年們如沐春風，如依慈母，自然薰陶在濃厚的三民主義空氣之中，培養成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。校長蔣先生和黨代表廖先生，所用的方法，是殊塗同歸的。正如一個家庭教育子女，父母都抱同一的目的，而收育的方法就有父嚴母慈之別，所以在當時的黃埔青年們看起來，校長是黃埔的「嚴父」而黨代表就是黃埔的「慈母」了。

廖黨代表是黃埔軍校的黨代表，也是我國自有政工制度的第一位黨代表。同時，他不僅是黃埔軍校的黨代表，幷且兼任着滇、桂、湘、粵、豫、建國各軍的黨代表，所以他這「慈母」之風，廣播在軍隊裏，每一個政工人員，都效法於他。因爲在部隊裏，一個主官，爲要達到訓練的目的，和戰鬥的任務，自然要採取較爲嚴格的態度和方法，而政工人員爲要收主義薰陶之效，他就要對于士兵，噓寒問暖，提攜獎進，盡一切努力，使其衷心悅服，澈底感化。這是不易的道理。

委員長訓示政工人員，對於衞生隊和醫院，「一定要天天去看，如果不能夠，至少一星期去看三五回。看的時候，一方面慰勞他們的傷，一方面是檢查器械藥品清潔不清潔，整齊不整齊，醫院或衞生隊的人盡責不盡責，辦得得法不得法。」推而言之，政工人員，當士兵疲倦的時候，應該唱歌給他們聽，演劇放電影給他們看；他們需要知識的時候，應該讀報給他們聽，寫字給他們認；吃飯的時候，看食料的養分夠不夠；天寒的時候，看他們身體冷不冷；他們和家庭通信的時候，應該替他們寫，替他們寄。這一切，不是同慈母愛護子女一樣的嗎？

四 爲甚麼要打仗？

革命軍的天職是要掃除革命障礙，要掃除革命障礙，便要學習革命技術。所以軍事教育的目的，是傳授殺敵的技術，是傳授怎樣獲得戰爭勝利的技術。而政治工作呢？第一就是告訴官兵們：「爲甚麼打仗」。他向士兵們指出，誰是我們的敵人，而且，他們爲甚麼是我們的敵人。只有如此，方可發揮人類的理性作用，纔能保證戰爭的技術，用以完成革命的目的，因而，戰爭的勝利，就是主義的勝利。

歷史的事實，顯明地擺在我們面前。本黨建軍之初，我們黃埔的教導兩團簡直是所向無敵，表現出驚人的英勇，到現在遂被人視爲奇蹟。當時的政治工作，眞的有甚麼神妙的技術嗎？不是的！它主要的就是告訴了大家，爲甚麼要打仗，和誰是我們的敵人而已。試看當日對教導團第一二兩團頒發的「士兵日課問答」，中間就有這幾條：

「問：你忘了叛逆的殘忍麼？

答：本黨受叛逆的殘忍，是我們黨員終身的恥辱。

問：你忘了國賊的橫暴麼？

答：國民任憑國賊的橫暴，是國民最大的恥辱。

問：你看見强權的壓迫了麼？

答：國民任憑强權的壓迫，是國民無上的恥辱。

問：你已經認識了你的主義麼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答：我已經認識了三民主義，就是我的生命。

問：你已經認識了你的敵人麼？

答：我已經認識了我的敵人是叛國賊與強權。

問：你已經認識你的恥辱了麼？

答：我已經認識我本身與國家的恥辱了。

問：你如何可以洗雪你的恥辱呢？

答：我要洗雪我的恥辱只有努力革命。」

再如當時黃埔軍校頒發了一紙「革命軍格言」，這格言說道：

「本校成立已經有九個月了。叛逆陳炯明還在惠州負隅。問我們同志，有沒有滅賊的胆量，有沒有拚命的決心。到了今日，爲甚麼還不能撲滅這種背信義的叛徒。這樣還能實行三民主義嗎？你想，可恥不可恥呢？諸位同志，不知道我們究竟甚麼時候可以打仗。只要等打仗的命令下來了，我們無窮的恥辱纔可以洗雪乾淨，三民主義纔可以開始實行，纔可以不負總理以下各同志的一番苦心，纔可以安慰先烈的靈魂。」

正因爲在平日已經把這些道理不斷地灌輸入學生及士兵的腦中，一點一滴都成爲革命熱情的燃料，這就是力量的根源，因之，打起仗來，纔能所向無敵。

在北伐時期，政治工作一本着傳統精神，使全體官兵知道我們爲甚麼打仗，誰是我們的敵人。蔣總司令當出師之際，昭告全體將士說：「帝國主義一日不推倒，則中國人一日不得喘息。而軍閥與土匪，皆爲帝國主義之工具。軍閥則視軍隊爲私產，防區爲地盤，舉民政財政一手把持而囊括之，且不惜倒行逆施，依附帝國主義以求生存。故全體將士，應一致以帝國主義爲公敵，殲除帝國主義工具之軍閥與土匪。」當時政工人員，就遵照這種訓示，去實施軍隊政治宣傳與訓練。所以不到一年的工夫，便把吳孫兩個大軍閥，掃蕩無餘。

及至七七事變發生，全面抗戰展開，國民革命的歷程，踏進一個新階段。政治工作因應實際需要，又有飛躍的發展。尤以二十七年二月擴大組織，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爲著。然而基本精神仍是一貫。譬如，當時奉准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組織大綱，開宗明義的第一條，便大書特書道：「爲喚起民衆，共同抗敵，提高軍隊革命精神，統一全國意志，集中一切力量，在一個主義，一個政府，一個領袖之下，驅除日寇，復興民族，完成革命，特於軍事委員會之下，設置政治部。」。這便已明白指示，我們之所以要打仗，就是爲的要「復興民族，完成革命」，而我們的革命對象，便是「日寇」！到了三十一年頒布政工典範草案，更於第一條規定着：「軍隊政治工作之目的，在使國軍確守共同信仰，鞏固國權護衞疆土，提高革命精神，加强作戰力量，以捍衞中

國國民黨所建立之中華民國，實現　國父所創造之三民主義，完成　總裁所領導之國民革命。」極顯明地昭示我們，凡有損害我主權領土，危害黨國，阻撓革命的都是我們的敵人，我們就要力予剷除。這便是我們爲甚麼打仗的大道理。我們政工人員最主要的任務，就是要將這般道理，使全體官兵澈底了解，這個基本任務達成以後，方才能談到其他的工作。

五　人民的武力

使官兵們知道「爲甚麼打仗」只算做到了一半政治工作，因爲現代的戰爭不僅是前線的戰爭，也不僅是官兵的戰爭。一個戰爭，如果得不到民衆的協助，便不能談到爭取勝利。尤其像我們的革命，發展到和侵略者的敵寇搏鬪的時候，已經是整個國力競賽，政工人員更應將民衆和軍隊結合成爲一片，纔能發揮偉大的力量。

總理領導本黨革命的時候，已經很明白指示出這一緊要的道理。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所發表的北上宣言中，曾主張「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，第二步，使武力成爲國民之武力，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。」

怎樣使武力與國民結合呢？首先便要瞭解民衆接近民衆，使人民知道我們爲甚麼打仗。譬如在第二次東征之時，東征軍宣傳總隊第二支部第三分隊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，於平饒城之報告，有一段說道：

「是日十一時率同隊員往常平墟，向市民宣傳我軍東征原因，及我軍主義紀律，并分途向團局警區接洽，勸市民安心營業。適該墟附近有還珠瀝村朗貝村葉陳兩姓發生械鬥，墟內紳董俱回鄉助鬥，因而市面稍形震動。六日特派員兩名，聯同軍隊直抵該兩鄉，勸其息爭。經得雙方同意，具結了事。七日晨，軍隊向謝岡進發，途經七塘，墨園，抵謝岡，鄉民因累被軍隊騷擾，一聞有兵抵境，即走避一空。幾經勸諭，亦不敢回，因而給養非常困難。八日向新墟移動，鑒於昨日現象，特率同隊員，先軍隊而行。路經黎村，井隆，鎮隆等墟，宣傳我軍紀律，散發各種傳單，并特製寫「革命軍人不拉伕，不搶掠，公平交易」等標語，入墟標貼，百姓再不逃避。經鎮隆時，且燃放串炮，歡迎我軍。」

我們只看這麼一點記載，便可知道，當日軍閥的軍隊，是離開了民衆怎樣遠，而我們革命軍隊，是極力接近民衆，替民衆解難解紛，向民衆宣傳，使其知道我們的主義怎樣，我們的紀律怎樣。這樣一來，民衆不僅不離開我們，還要歡迎我們，親近我們怎樣能成爲民衆的武力呢？一個總答復：就在爲人民謀幸福。所以　總理北伐宣言，於列舉具體目的之後，便昭告國民：「凡此一切，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，以統一全國，實現眞正之民權制度，以謀平民羣衆之幸福。」在北上宣言，同樣地又說道：「以上諸端，凡屬國民，不別其爲實業家，爲農民，爲工人，爲學界，皆無不感其切要，而共同奮鬥，以期其實現者也。」革命軍人，既然爲着民衆幸福不惜犧牲生命，苦戰疆場，民衆自然把他們如同兄弟手足一般愛護，無所不至；把革命的武力，認爲就是自身的武力。

這種寶貴精神，在十五年本黨出師北伐的時候，充分表現出來。那時民衆苦於軍閥壓迫，我們革命軍隊所到之地，替他們減輕負擔，解除痛苦，我們政工人員，更能和民衆接近，努力宣傳。民衆對於革命戰爭的助力，眞不可估計。當時孫傳芳在戰敗之餘，就曾經說道：「這一回江西戰敗，幷不是戰略戰術的缺陷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革命軍的宣傳力太强，他們處處都能得民衆的援助，而我們處處受民衆的攻擊，這是戰敗的最大原因。」

到了二十六年全面抗戰發生，正是敵我國力的總決鬥，本黨領導着全國軍民致力於空前偉大的事業。這時革命武力，爲着全民族的生存而奮鬥犧牲，所以這革命武力也就是民衆的武力。民衆和武力自然會凝結成一個戰鬥體，去從事抗戰。早在抗戰初期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的時候，便在工作實施綱要的一般原則中規定：「軍事爲建設國家復興民族之唯一基礎，務求做到軍事社會化，社會軍事化，官長士兵化，軍隊民主化，使兵、工、農、商、學、結爲一體。」及至三十一年頒布「政工典範草案」，有更明顯的規定。其第一條說：「政工爲軍民合作之橋梁，應本「武力與民衆結合，武力成爲民衆武力」之原則，使軍隊服務民衆，愛護民衆，幷對民衆實施訓練宣傳，使其尊敬軍人，協助軍隊。」

在八一三戰幕初揭的時候，京滬線上各都市的民衆，眞是萬分熱誠協助後方勤務工作。譬如，在蘇州一個小的地方，人民自動捐出許多棉被，醫生自己捐出藥品，青年的女孩子們，自動去受看護訓練，瞬轉工天，就成了許多後方醫院，能收容幾百個傷兵。尤其感人的，許多人力車夫，自動把傷兵扶上車送到醫院門首，又把他扶下車來，送入醫院之中，傷兵們都感覺到很大的安慰。這只是軍民團結的一例。在每一次戰役中，民衆給軍隊的幫助和熱烈參加戰鬥的忠勇事蹟，是不勝枚舉的。

當然，我們也不能否認戰時的民衆組訓工作，也受到許多法律上和職權上的限制，不容易充分展開，又因爲在劇烈的戰爭期間，軍隊的流動性太大，補充的次數較多，工作尤其難得圓滿，軍民關係，還沒有達到理想的緊密。政工人員本身，是深深知道這個缺點，而時求改進。

六　從東征到北伐

提起軍隊政工，人們便要聯想到東征和北伐的全盛時代。現在先從東征說起。當時開始東征的教導兩團，就是黃埔的校軍（旋改稱黨軍），這兩團的基本幹部，都是黃埔第一二兩期畢業生。所以政治工作的精神，自然是一貫的。黃埔軍校實施黨代表制，校軍的教導兩團，也實施黨代表制，在團、營、連各部，均設有黨代表，和團、營、連長立於相等的地位，黨代表的職權，是代表最高黨部，指導軍隊中各級黨部與政治工作（第二次東征時，黨軍已改成爲國民革命軍，增設軍師政治部）。使軍隊成爲主義的武力。黨的力量深深透入部隊，像一種鐵筋銅骨，把整個部隊團結鋼鐵一般的堅固。

教導兩團在校之日，已經受到革命空氣的薰陶和主義的訓練，譬如我們前面所說的「士兵日課問答」便是一種很好的訓練材

料。雖說總共不過只四十多條，却能扼要地，把主義和政治理想灌注入士兵頭腦裏，同時幷能把民衆的痛苦，軍閥和强權的罪惡眞切地描寫出來，而激勵士兵們敵愾情緒。再譬如說，當時所發下的一種愛民歌，眞是切於實際，體貼入微。開頭有幾句說道：「三軍個個仔細聽。行軍先要愛百姓。賊匪害了百姓們，全靠官兵來救生。百姓吃了苦，全靠官兵來作主。第一紮營不要懶，莫向人家取門板。莫折民房搬磚石，莫踏禾苗壞田產，莫打民間鴨和鷄，莫借民間鍋和碗。」中間又有一段說：「更有一句要緊話，莫擄人家當長伕。一人被擄挑擔去，一家號哭不安居，娘哭子來眼也腫，妻哭夫來淚也枯，」我們只要看這簡簡單單幾句話，便可推知當時政工人員實在是深切地用了自家的頭腦，務使自己所要教訓的話，深深打入士兵的心坎，激發起他們的良心，生出實在的效果。

再說到宣傳罷。黃埔當時，已經發行壁報，畫報和其他刊物；而且組織有「血花劇社」，演出「還我自由」「黃花崗」「鴉片戰爭」等富於革命性的話劇。又組織有俱樂部，便於官生士兵研究學術和從事高尚娛樂，當時軍中文化，已經相當發達。

一到戰時，便充分發揮了平時訓練宣傳的效果，十四年的春天，第一次東征，教導兩團參加作戰。黃埔軍校也派員組織宣傳隊，做軍隊的先導，每次軍隊出發前數小時，派宣傳隊一隊，先行到應經過的地點，向民衆作廣大的宣傳，使其明瞭東征意義。幷講解革命軍人與軍閥不同之點，因而軍隊得了民衆極大的助力，一戰而克復東江。

十四年十月的第二次東征，軍隊既經擴充，軍師政治部先後成立，政治工作更爲開展。譬如，東征宣傳隊隊員，已有二百三十七人之多，宣傳的技術，也更爲精密。如當時已將隊員按其能說東江語，廣州語，潮梅語，普通語及不能普通語等項，作成百分比之統計，分別使用。這次東征獲得驚人的勝利，我們不能不認爲政治工作有很大的貢獻。因爲革命軍隊受了政治訓練，確有良好紀律，已爲一般民衆所深望，更樂爲革命軍之助，同時我們更應該知道，當時的政工人員，都是黃埔畢業的青年革命軍人，他們眞能本着革命精神，冒險犯難，身先士卒，爲部下的表率。例如惠州攻城之役，至爲艱難，譚鹿鳴，徐廷魁，曾擴情等營連黨代表，分任攻城先鋒隊隊長任務，奮勇當先，士兵們自然深受感動，前仆後繼，獲得輝煌的戰果。

北伐時期的政治工作，從精神方面看，自然是始終一貫，但從制度和組織方面看，就有了很多的演變，很大的發展。最初黃埔軍校的兩團「校軍」在十四年四月便正式改成「黨軍」，八月又擴充爲「國民革命軍」。到十五年七月誓師北伐之際，國民革命軍已有八軍之衆，至於政治工作的主管機構，當國民革命軍成立時便已成立軍師政治部；十五年二月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。七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，又將政治訓練部改爲總司令部政治部，而各軍師政治部和團連指導員都配備完全，政治訓練與軍事訓練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。（組織沿革詳附錄）當時的政治工作和最初是一貫的，它的任務，在堅定主義信仰，提高戰鬪精神，嚴肅軍隊紀律，這是東征時期的基本精神。「不怕死，不愛錢，愛國家，愛百姓」的口號，已經是銘刻在每一個革命軍人的心靈深處。這是軍隊本身的信條。而對民衆方面所著重的；還是宣傳。革命軍所到的地方，就是革命主義空氣籠罩的地方。例如

許多宣傳團隊同赴前方，在戰區作化裝宣傳，聯絡軍民感情，收效很大。加以政工人員表現刻苦耐勞的精神，努力民衆工作，而士兵們都能愛護民衆，體貼人民的痛苦，久受軍閥鐵蹄蹂躪的民衆，看到這種情形，眞有「大旱雲霓」之感。他們看見一個革命軍人，便把他看做家人手足一樣，把他團團圍着問他的戰爭消息，問他的國家大事，問他的鄉土人情，談一個不休。革命軍人也藉着這個機會，做宣傳工作，軍民情感的融洽，可說是達到最高點了。正是因爲這個道理，所以革命勢力，好像狂風怒潮一般席捲而前，軍隊所到之處老百姓不僅簞食壺漿，歡欣鼓舞，而且爲革命軍帶路，供給情報，協助運輸，冒着敵人的砲火，與軍隊并肩前進，把軍閥的隊伍，弄得四面楚歌，一籌莫展。北伐的迅速完成，軍隊和民衆，應該得到同樣崇高榮譽的。

但是由於革命的軍事發展太快，從第一次東征經過北伐而奠都南京，總計時間不過兩年零四個月，革命軍的隊伍，却由兩團擴充到幾十個軍。這麼龐大的隊伍，需要大量的政工人員。訓練能，一時來不及，所以選拔和任用的尺度，不能不較爲放寬，人員的素質，自然不能像從前那樣整齊了。十五年冬，在南昌所召集的國民革命軍軍隊善後會議中，曾討論到「愼重政工人選」，足以反映當時政工幹部的素質，已經相當成爲問題了。

其次，我們也看得出來，政工人員的工作也太繁，責負也太重。北伐的時候，革命軍所克復的地方，一切黨務，政治，以及民衆運動都責成隨軍出發的政治部暫時處理。甚至委任地方官吏，裁判特殊案件，檢舉有關罪犯，辦理地方交涉。也都由政治部執行。職權這麼廣大，事務這麼紛繁，政工人員自然不能夠勝任愉快。

最後不能不提到的便是思想問題。最初共產黨憑藉「容共」的一切便利，攙入了軍隊政工的陣營，一心要奪取政工的領導權，與本黨的同志發生鬬爭，造成內部摩擦，部隊思想領導的中心，發生了分化現象。部隊長自然不能不加以警戒。尤其共產黨利用機會，企圖領導民衆運動，挑起階級鬬爭，社會陷於極端的不安；人民對於政治工作，也沒有從前那樣的信仰，而政工本身，就發生了「存廢」問題。

這個趨勢，到了「寧漢分裂」，它的嚴重性達到了最高度。北伐軍在十六年，因八月　蔣總司令下野曾一度陷於頓挫，軍隊中的政治工作，也同時中斷。十七年一月　委員長復總司令職，繼續領兵北伐，三月改總政治部爲政治訓練部，各級政工機構同時改爲政訓處。卒以經費缺乏，幹部欠健全，不得不將各級政工人員逐步裁撤。北伐完成以後，再將政治訓練部改隸於訓練總監部改稱爲政治訓練處。煊赫一時的軍隊政工，到此成爲「象徵」的存在了。

剿匪之役，是含有濃厚政治性的戰役，是三民主義戰勝反革命的偉大業績中的一段路程，是中國埋頭準備反抗侵略復興民族的初步工作。也是政工發展紀程碑上一段值得紀念的史蹟。從二十年起，在贛鄂兩地成立剿匪宣傳處，在剿匪的各師和獨立旅，都配備上宣傳分處。同年冬兩個剿匪宣傳處合併，改稱爲訓練總監部剿匪宣傳處。二十一年六月，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，設立政治訓練處於漢口，贛粵閩邊區剿匪司令部成立政治訓練處於南昌。七月將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移歸軍事委員會直轄。二十

二年春。又將兩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裁撤，各師政治工作一律歸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直接指導。

剿匪時期的政治工作，除對軍民作普通的宣傳外，則從事於協助調查戶口，編制保甲；進而組織壯丁隊，剿共義勇軍，守望隊，偵緝隊；同時辦理收容難民，訓練俘虜，監督傷兵醫院等事項。二十四年春盤據江西之匪西竄，國軍跟蹤追擊，在四川設立政治訓練處重慶行營分處，又成立西北剿匪軍總司令部政訓分處。在匪患肅清之區，政治工作則置重於富有積極性之新生活，國民經濟，勞動服務諸運動。

大時代到來了，日寇對於我們的進攻，由「五三」而「九一八」而「一二八」，由「一二八」而「七七」而「八一三」接連不斷地進迫。政工在剿匪時期，是不斷以提高對倭的敵愾爲中心工作。當時的口號是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也就是說，「安內」是初步準備，而「攘外」是最後的目的。當時各級政工人員，在部隊裏面，對於未來的抗倭作戰，是用盡了一切的技術來說明，來訓練，來培養旺盛的攻擊精神。而最重要教材，就是　委員長在廬山軍隊訓練團所訓示的「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」。到了「七七」事變發生，已經是臨到最後關頭，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少，一致抗戰之時，政治工作，何等重要，當時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，便竭盡全力，負担此戰時政治工作的重任。但這個重任，以當時的那種組織，是沒有法可以完全負得起來的，新的環境，發生新的產物，新的工作，需要更新的機構，本部——軍事委員會政治部，遂於二十七年春成立，從此政工遂入一個新的時代，而寫出他自身歷史新的一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